

January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rines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The Dispersion of Meta-Narration and the Plight of Essentialist Poetics

Yanfe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Yanfeng. 2016.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rines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The Dispersion of Meta-Narration and the Plight of Essentialist Poetics."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183-19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14>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话语反思

——兼论元叙事的弥散与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困境

李艳丰

摘要:随着现代性的断裂与“元叙事”的弥散,本质主义思维范式日渐陷入知识表述的危机,“大理论”的历史走向终结,“后理论”时代来临。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范式与知识图景,“后理论”倡导以反本质主义、非中心化、多元化、历史化的知识立场来重构理论的合法性效度,反对固守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总体性与同一性逻辑。面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本质主义“文学性”话语范式与本质主义诗学开始面临知识“合法性”的拷问。文章在批判性反思与重构“文学性”话语的同时,亦对“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预期与展望。

关键词:“后理论”; “文学性”; 元叙事; 本质主义; 诗学

作者简介:李艳丰,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文艺学、文化研究。电子邮箱:279569456@qq.com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7批面上项目“理论反思与批评实践:文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化政治维度”阶段性成果[基金编号:2015M57057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从审美意识形态论到文化政治诗学”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4CZW05]

Title: Reflections on the Literariness in the Post-Theoretic Era: The Dispersion of Meta-Narration and the Plight of Essentialist Poetics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spersion of meta-narrative and the break-up in modernity, the paradigm of essentialist thinking faces the increasing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of knowledge. The history of “big theory”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 “post-theory” emerges as a new paradigm of discourse and system of knowledge. Post-theory takes on an anti-essentialist, non-centralist, pluralistic and historized standpoint of knowledge to reconstruct the validity of legitimacy, opposing rigid essentialism, logocentrism and the logic of totality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advent of post-theory, the discourse paradigm of essentialist literariness and the essentialist poetics are faced with the question over the legitimacy of knowledge. This paper aims at a reflective critique of the discourse of literariness and attempts to anticipate some possible developments of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ra of post-theory.

Keywords: post-theory; literariness; meta-narrative; essentialism; poetics

Author: Li Yanfe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0, China), and a post-doctoral fellow in th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with academic interests in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cultural studies. Email: 279569456@qq.com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陆续传出“抵抗理论”、“反理论”、“理论死亡”、“理论终结”的呼声。詹明信在《德国批评的传统》中曾如此言及:“今天在理论上有所发现的英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了”(303)。随后,W·J·T·米切尔

的《反抗理论》,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抗》,卡维纳的《理论的限度》,M·麦奎伦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尼尔·路西的《理论之死》,伊格勒顿的《理论之后》等相继推出,批量化的知识生产将“后理论”构建成为当代文化知识界的一个重

要“话语事件”。“后理论”究竟表征着怎样的所指意蕴,又给当代理论界带来了怎样的思想更新与意义增补?结合诸多理论家的看法,本文认为,“后理论”并非指理论的终结与死亡,而是指理论“宏大叙事”的衰微与弥散。“后理论”倡导以反本质主义、分离主义、非中心化、多元化、差异性、碎片化与部落化的知识立场来重构理论的合法性效度,反对固守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总体性与同一性逻辑。“后理论”是理论在新的文化语域之下所作出的一种自反性策动,它祛除了理性神话的本质主义魅魅,喻示着新的理论范式与知识图景的形成。面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的领地将不再会显得风平浪静,理论的否定、批判、反抗与僭越势必如火如荼的展开。哲学、政治、伦理学、美学与文学理论等,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后理论”的思想情势下作出理论的内省。除旧布新、与时俱进、实践生成,成为“后理论”时代理论在场的主导性话语症候。就文学理论而言,很显然,那种以传统认识论为思想地基,以科学主义为结构肌理,以“文学性”为话语内核的本质主义诗学范式,已很难再获得普遍有效的理论认同。“文学性”曾一度被视为文学的恒定本质。而在“后理论”看来,任何本质主义的设定都是理论误思的产物。文学并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文学性”,有的只是具体时空中被建构与生成的关于文学的知识图景。本文的写作旨归,正在于以“后理论”话语为切入点,通过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的“文学性”问题,以揭集本质主义诗学的困境,进而在理论的断裂地带,为新文学理论知识质态的衍生寻找可能。

一、“后理论”:一种新的话语范式与知识图景的生成

20世纪可谓是一个“理论帝国”的世纪,各种理论竞相演绎、此起彼伏。理论的兴盛折射出20世纪西方知识界普遍的精神意向与思想情态,即人对理性的膜拜,以及人通过理论知识去把握事物本质的信念。像新黑格尔主义对世界本质的唯心主义阐释,对整体性、绝对乃至上帝的证明;现象学理论对先验本质的直观,对知识确定性的追求和对艺术本体论的建构;结构主义对稳定性、秩序与深层结构的探求;现代性对启蒙理性与真理

价值的信仰;批判理论对否定辩证法的推崇,对审美主义与文化解放的诗性畅想等,反映出理论对普遍性、总体性的遵从,对“元叙事”的冲动和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辐射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滥觞,现代理性的运演开始走向失范与失效,文化精神的整体性被打破,人的主体性与镜式本质被解构,先验的理性反思让位于经验的感性实践,理论的深度模式在大众化、消费化的欲望生产机制中走向弥散。这种文化语境的结构性嬗变,必然带来理论知识界域的反思与调整。是固守理性“宏大叙事”的话语逻辑,继续玩味“以普遍性为赌注”的本质主义游戏,还是果断抛却“大理论”的学科霸权与意识形态性,进而在破除理论误思与迷执的同时,重构理论新的话语范式与知识图景?

回溯20世纪后期西方理论的发展,可以明显发现,随着一代代大师的相继谢世,“大理论”已无可奈何地走向式微,理论日益陷入知识表述的危机,“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早已消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3)。理论创生的瓶颈及新理论的空缺与贫乏,敦促知识分子走向理论的反思与自省。80年代已降,西方一批伦理学家,如伯纳德·威廉斯、保罗·泰勒、麦金太尔、安妮特·贝尔等,掀起伦理学的“反理论”运动。纳斯鲍姆曾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谈到这一现象,她指出,安妮特·贝尔和威廉斯“这两位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盟友倾向于反对伦理理论化的事业。他们把这种事业与理性在伦理生活中的过度作用联系起来。尽管贝尔确实用一种同情的态度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特殊主义,但她把它描绘为一种反理论,或者把它描绘为理论化事业的一个替代品”(21)。伦理学的反理论倾向,主要反对的是那种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抽象的道德理论。哲学中具有反理论意味的主要是维特根斯坦、罗蒂的反本质主义以及利奥塔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词语的“意义即用法”与“家族相似”理论,彻底解构了语言分析的本质主义理论规划。他甚至说:“我们不会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察中没有任何假设性的东西。我们必须抛弃一切说明,而仅仅代之以描述”(71)。罗蒂自命为反本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类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再有本质”,本质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终结体现了

一种“从崇拜上帝到崇拜人到崇拜经验科学工作者的变化。我们实用主义者认为,幸运的是,这个过程最后使我们不能崇拜任何东西”(153)。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直接指向现代学科帝国主义与宏大叙事逻辑。他认为,一个学科或论说是现代主义的,是因为它用来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办法是祈求某个元学科或“元叙事”。后现代乃是一种新的理论态度与知识生产方式,它试图在消解理论的“元叙事”与“统一的整体”之基础上重建理论知识的合法性。凯瑟琳·伯加斯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共谋,使元叙事失效,瓦解自主的主体,从而使得建构任何新的以客体为中心或以主体为中心的伦理学、美学和价值论变得不可能”(阎嘉 283)。在文艺理论领域,尼尔·路西、费什、德曼、卡勒等人的思想,折射出“抵抗理论”的倾向。尼尔·路西的《理论之死》将反理论主义的倾向追溯到浪漫主义阶段,认为“浪漫主义把审视符号的工作交给了认识,却在追寻永远难以捉摸的符号过程中,释放了想象难以控制的活力”(阎嘉 245)。不幸的是,理论阻断了通往美学的“喜爱”或者审美“感觉”的道路。尼尔·路西所谓的理论,主要是指那种压制、排斥具体审美经验与审美趣味的“元理论”。费什批判了“将某一些事物的规则/体系视为自然和永恒的”伪理性,“这种试图对现存事物秩序加以合理化的伪理性阻碍人们去获得自由和独立,而正是这种自由和独立才构成一个人的真实本性。”费什指出,“反对理论所申言的仅仅是:普遍性(一般性)取代地方性(局部性)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办到。所谓理论是一件永远不可能企及的事”(100)。“理论将会完结,当它使尽了一切招数,精疲力竭,当对理论的需求和畏惧作为其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逐渐消失,或者被其他表现形式所代替”(费什 128)。保罗·德曼在《解构之图》中为我们描绘了当代文学理论的某些不确定因素,如伦理与审美价值对理论形态的敌视,理论思辨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冲突,“文学性”的概念化同审美阅读的矛盾等。但保罗·德曼并不认为文学理论会在“理论的抵抗”中走向终结,“然而,文学理论并没有沉没的危险;它不由自己的兴盛起来,而且愈是受到抵制,它就愈是兴盛,因为它讲话的语言是自我抵制的语言”(114)。卡勒认为,理论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

语”,“是一套包罗万象的文集大全”,“理论的不可控制性是人们抵制理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文学理论入门》17)。诸多关于“抵抗理论”、反理论、“理论之死”的话语陈述,反映出西方现代理论“元叙事”走向弥散之后理论发展呈现出的新质态和新向度,伊格尔顿、拉曼·塞尔登、卡勒等将这一理论现象命名为“理论之后”(Theory after theory)或“后理论”(Post-theory)。

作为一种新的话语范式与知识图景,“后理论”究竟昭示着怎样的理论启悟,又给当代理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契机与可能?本文认为,至少可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理解“后理论”的理论意义。首先,“后理论”并非是指理论的终结与死亡,也非是理论的绝对衰落。诚如卡勒所言:“谈论理论的死亡是愚蠢的,或许只是一厢情愿”(《当今的文学理论》49)。伊瑟尔认为:“我们目前谈论的理论的衰落指的是我们对理论的误读,而不是理论本身过时,因为即使是对现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而言,如果它想要传递一开始就被概念化了的文化现象,就无法离开理论”(11)。可见,“后理论”不是一场理论的告别演出,它真正所要表达的是那种固守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普遍性、总体性与同一性逻辑的“大理论”的知识危机。西方现代理论在“元叙事”的规约之下,以求取本质、基础、中心、普遍性等为名,无限拓补理论知识的增量,最终将理论豢养成为“特瑞法力斯”式的百头巨怪。“后理论”表达了新的理论范式的生成,即在批判“大理论”之专断、盲目、虚妄、牺牲经验、脱离实践等负面因素的同时,转而以反本质主义、分离主义、实用主义、非中心化、多元化、差异性、碎片化与部落化的知识立场来重构理论的合法性效度。当然,“后理论”并不指向某种具体的理论形态,而是像拉曼·塞尔登所言,“后理论”意味着大写的理论迅速发展成小写的、众多的理论,“理论转向时期”孵化出大量的、多样的实践部落,或者说是理论化的实践。“后理论”昭示的是“即将到来的理论”(拉曼·塞尔登 12)。其次,“后理论”作为“可能的理论”,为当代理论的辩证发展提供了新的知识图景。知识图景是伊瑟尔在探讨文学理论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特定时代知识系统所赖以形成的一种话语关联总体,这种关联总体为知识生产提供背景、动因、框架和标准。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图景,“后理

论”提倡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实现理论的知识建构,反对理论的自律自足本性与学科霸权意识;“后理论”把理论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实践建构与文化生成,强调理论同实践经验的耦合;“后理论”强调以互文性、主体间性、对话主义与建构主义策略来重构理论的历史维度与现实品格,在跨界研究与跨学科实践中达成理论的交流、融合与创生;“后理论”为理论本身设定了自反性逻辑,使理论在发生与运演的过程中能时刻保持着否定、批判、抵抗与僭越的辩证特质;“后理论”以詹姆斯所谓的“永远历史化”的自由意志取代了“元叙事”的理性法则。就此而言,“后理论”可谓是带着无限乡愁与皈依情结的理论,它不通往固定的寓所,而是永远在路上。最后,从理论的价值期待来看,“后理论”既不像“大理论”那样对客观知识、科学理性、绝对真理等“元叙事”顶礼膜拜,也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那样刻意渲染逃避主义、虚无主义与相对主义。“后理论”提倡用怀疑与证伪的态度来面对一时一地的问题,要求在有限的自由与尺度范围内获得理论的相对正确性与适用性。可见,“后理论”并非是完全拒绝“大理论”的问题意识,它要做的恰恰是缝合、弥补与矫正的工作,是戳穿“合法”的谎言,揭露被隐匿与遮蔽的理论真相。如伊格尔顿所言,“后理论”的真正使命是对那些迄今尚未触及和思考的问题寻找答案。卡鲁斯等认为,“后理论”是一个事业,“这一事业首先包含了将其体制化和国际化加以理论分析的理论工作;它根据一种‘将要出现的’理论,预见到对理论的‘他者’(被理论所压抑、排斥、从未思考过的东西)的批判性回归”(Callus 8)。

“后理论”话语的播撒与蔓延,宣告了“后理论”时代的到来。面对工业文明高度发达、消费主义文化滥觞、精神整体性破碎、确定性与普遍性丧失、“元叙事”弥散、文化族群化与部落化的“后理论”时代,任何关于理论的态度、方法、范式、价值等都将随之发生变化。政治、伦理学、哲学、文学理论与美学等,都亟待在理论的自反中突破传统的桎梏,进而实现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就文学理论而言,由于长期遵奉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规约,文学理论俨然变成了一种文学哲学。就像德曼所言:“今天的文学理论,是更大的哲学思辨的副产品”(99)。像现象学文论、精神分析文

论、结构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形式主义文论等文论范式,无一不呈现出文学哲学化的理论踪迹。文学理论变成哲学的沉思,意味着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要被归化为哲学命题。但文学的想象性、诗性、感性化、语言修辞等特质,又决定了文学理论天然的“反理论”化倾向。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为了获取关于文学的稳定的、普遍的、恒定的本质属性,不惜冒着将文学从历史在场、审美经验与文本实践中放逐的危险。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必将面临多重抉择。它既要反思与批判各种关于“文学本质”的“元叙事”话语的理论局限,破除本体论的“囚牢”,又要在“后理论”的知识图景之内探索文学理论话语重构的诸种可能性。很显然,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但文学理论要想真正获得反思与创新的能力,就必须有自我策动的理论意识;文学理论要想真正对现实有所言说,就必须从抽象的理论王国回到审美的文本世界。这也是“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使命之所在。

二、“文学性”：“元叙事”时代本质主义诗学的“阿基米德点”

“文学性”概念最早源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自雅各布森的《现代俄国诗歌》:“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托多洛夫 24)。雅各布森虽然并未直接将“文学性”等同于文学的本质,但结合其诗学理论来看,“文学性”概念无疑是雅各布森形式主义诗学的逻辑起点。在雅各布森看来,构建一门文学科学是可行的,其关键是确立其研究的对象——“文学性”。究竟何为“文学性”?雅各布森从语言学研究方法入手,将“文学性”视为文学语言的特性,这种语言特性包括词语的使用,音律节奏,文学程序与技法及其内在规律性等。诗学研究的是具有美学功能的语言,是词语进入诗歌时的变形以及由此产生的程序系统,是诗歌语言的文学法则和共时性结构。除雅各布森外,其他形式主义文论家虽很少直接谈及“文学性”概念,但在关于“文学是什么”以及诗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等问题的回答上,却表现出理论的一致性。比如,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诗学研究的是艺术技法和小说结构,诗意的美感源自艺术语言

与形式的“陌生化”原则。艾亨鲍姆认为:“文学——历史事实是一个复杂的思维产物,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文学性。它的这种特征使得对它的研究只能沿内在一进化的线索进行,才能产生任何成果”(罗伯特·休斯 128)。艺术家的真正秘密在于用形式消灭内容,艺术的形式越成功,艺术的内容也就越受欢迎。托马舍夫斯基认为,诗学的任务是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方式。日尔蒙斯基认为:“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自己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形式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这样一种学说中:艺术中的一切都仅仅是艺术程序,在艺术中除了程序的总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别的东西”(方珊 360)。虽然,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没有直接言明“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但它们对文学语言、形式、程序、技法与结构的普遍关注,以及文论话语所彰显出的理性意识与美学精神,却为“文学性”话语范式的本质性生成提供了理论土壤。

自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之后,“文学性”话语经埃利希的译介和阐释,并在卡勒、托多罗夫、韦勒克、詹姆逊、托尼·本尼特等人的理论演绎下,最终被形构为“元叙事”时代本质主义诗学话语的“阿基米德点”。埃利希是最早将“文学性”概念传至英语世界的学者,他在《俄国形式主义:历史与理论》中详细介绍了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将“文学性”视为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理论。他认为,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将“文学性”视为文学的“区别性特征”,即文学语言内部的规律,如词语的使用、程序、结构与技法等,“正是在诗人所使用媒介的方式上,雅各布森与大部分形式主义文论家看到了“文学性”之所在”(Erlieh 81)。卡勒在《文学性》一文中曾深入探讨“文学性”概念,他认为:“文学性的定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作为鉴定是否属于文学的标准,而是作为理论导向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利用这些工具,阐明文学最基本的风貌,并最终指导文学研究”(29)。但卡勒并未真正阐明何为“文学性”,反而最终陷入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内部与外部的多重矛盾之中。在《文学理论入门》中,卡勒直接解构了文学本质的命题,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权威们认定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对文学性进行思考就

是把文学引发的解读实践摆在我们面前,作为分析这些话语的资料:把立即知道结果的要求搁置一下,去思考表达方式的含义,并且关注意义是怎样产生的,以及愉悦是如何创造的”(《文学理论入门》44)。这种态度的转变其实也折射出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困境。托多洛夫从结构主义诗学的理论立场论述了“文学性”:“诗学的客体并不是文学作品本身,它所考察的是一种特殊的话语——文学话语的属性。”“这门科学所关注的不是实在的文学而是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它所关注的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抽象属性,亦即文学性”(胡经之 310)。托多洛夫将“文学性”视为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抽象属性”,即符号系统的共时性结构、程序与模式等,使“文学性”命题进一步陷入本质主义诗学的囚牢。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将“文学性”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的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和艺术的本质”(276)。詹姆逊在系统分析了形式主义文论之后指出:“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独特主张,便是顽强地坚持内在文学性,以及固执地拒绝脱离‘文学事实’而转向其他的理论形式。”“俄国形式主义者一开始便分离出事物的内在因素本身,将他们特定的研究对象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区别开来,并对雅各布森称之为文学性的东西,即文学自身的区别性要素,进行系统考察”(詹姆逊 34)。托尼·本尼特认为:“如果存在一个口号可以把形式主义团结起来,那这个口号就是文学研究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程序。对于这样的一门科学,首先应该做的就是指出其讨论对象的性质,弄清它将要成为一门怎样的科学,并清楚地规划初期概念的范围。正如我们所见,这都可归结为文学性的问题,即确定文学独有的确切性质,发展适当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上的过程,用以分析文学文本独特赋予的形式特性”(40)。结合诸多理论家对“文学性”的话语阐释,可以看出,“文学性”最终被视为文学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主要表现为文学语言的内部规律,文学形式与技巧,结构与程序等,而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要素则要么被悬隔,要么变成文学形式的“材料”。正是在“文学性”的思想地基之上,西方文学理论进一步朝着“元叙事”的路径演进,最终形成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结构与话语范式。

以“文学性”为逻辑起点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究竟具有哪些方面的特征?本文拟从四个层面作出分析。首先,本质主义诗学追求理论的科学性。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大多认为,构建一门科学的诗学是可能的。雅各布森之所以提出“文学性”命题,其目的正在于确立诗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以最终形成科学的诗学体系。艾亨鲍姆指出:“所谓‘形式方法’,并不是形成某种特殊‘方法论’系统的结果,而是为了建立独立和具体的科学而努力的结果”(托多洛夫 19)。日尔蒙斯基认为:“理论诗学应当依赖具体的史料,建立科学的概念体系,这个体系是诗歌艺术史家在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时所必须的”(方珊 225)。这种对理论科学性的追求在结构主义文论与英美新批评中亦有明显反映。结构主义文论对文学现象背后之恒定结构的理性探索,英美新批评对诗本体的预设,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艾略特的“去个性化”思想,布鲁克斯关于“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以及韦勒克所谓的“唯一正确的概念无疑是‘整体论’的概念,它将艺术品视为一个千差万别的整体,一个符号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隐含着并需要意义和价值的符号结构”的整体性批评观念(韦勒克 277),无不折射出文学理论的科学主义精神。其次,本质主义诗学强调文学语言修辞与形式结构的本体性。不管是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还是英美新批评,其理论发端都源自语言学的革命。“文学性”主要被视为文学的语言修辞属性,以及文学语言背后的共时性结构模式,诗学则更多被视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与修辞学的变种。保罗·德曼就曾指出:“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它以各种方式,从诸多方面破坏这种模式的内部平衡,从而破坏其向外的朝非言语世界的延伸”(106)。这种对语言形式与内部结构的本体论强调,被詹姆逊称之为“语言的囚牢”。再次,本质主义诗学具有明显的“非历史化”特征。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论以及英美新批评等形式主义文论看来,要想建立一门科学的文学学科,就必须剔除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历史批评与心理主义的主观性评价,将文学从外部研究的混乱秩序中拯救出来,在共时性层面重新确立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即文学语言技法、程序结

构等内部属性。文学阅读变成了一种“非历史化”的内部阅读,文学研究则变成成为纯粹的“内部研究”。布迪厄指出,形式主义文论要求“抓住在不同种类下特别是诗的普遍形式下的文学存在,‘文学性’,也就是说进行反历史结构的结构,这些结构是世界文学或诗歌构建的原则,或者更通俗地说,某种类似于‘文学’、‘诗歌’的‘本质’的东西”,本质主义的分析“不知不觉地将个别情况加以普遍化,并由此将艺术品定时定位的个别经验转换为一切艺术认识的超历史标准”(344)。最后,本质主义诗学强调文学艺术自律自足的本性以及审美主义的价值旨归。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对“文学性”的反思,结构主义诗学对文学稳定结构模式的追求,英美新批评对诗本体的构想,所折射出的共同逻辑前提是本质主义文学理论对文艺自律自足本性的先验设定。在他们看来,文艺有着稳固的超历史的恒定本质,这个本质突出表现为文艺形式结构的自足自律,科学的文学理论正在于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求取自足自律的形式本体。文学阅读乃是对文本形式的一种不计利害的非功利的审美主义阅读,它悬隔一切政治、伦理、历史的内容,在形式化的词语激活与结构历险中萃取诗意的审美效应。如布迪厄所言:“哲学家、语言学家、语义学家、艺术史家对文学的特定性(‘文学性’)和诗的特定性(‘诗性’)或一般意义上艺术品以及它们引起的固有的美学认识问题提供的多种答案,一律把重点放在无动机、无功能、不计利害等等这类属性上”(343)。这种滥觞于康德美学的纯艺术精神,经过现代主义艺术的不断实践,最终成为本质主义诗学理论的核心价值观念。

“文学性”话语的衍生与播撒,反映了“元叙事”时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本质主义诉求,这种本质主义的话语范式同西方现代性以来的理性精神保持着内在同一性。对“文学性”的设定以及求取“文学性”的过程,表面上是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但实际上却折射出现代理性对人文世界的意识形态霸权逻辑,其间的问题意识并未溢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怪圈。以“文学性”为“元理论”而建构起来的本质主义诗学,在推动文学理论研究走向学科分化与独立的同时,也因其对真理、本质、同一性、普遍性、反历史化的盲目遵从而最终跌入本质主义的理论幻象之中。就此而论,

“文学性”理论彰显的其实是一种新型的文学话语权力,它以真理的名义实现自身的“事件化”与“历史化”,在“元叙事”时代不断固化自己的“合法性”。随着“元叙事”的弥散与“后理论”时代的莅临,本质主义诗学日渐陷入理论言说的困境。比如,文学理论是否可以成为科学?如果存在所谓的“文学性”,那么它究竟是文学的恒定本质,还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与建构的?“文学性”除了指称文学语言、形式与结构等内部因素之外,是否还同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相关?“文学性”到底是关乎文学的实然之在,还是一种话语范式抑或语言的命名?诸多新的问题域,敦促文学理论作出历史化的反思与策动。

三、“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 理论反思与话语重建

面对“后理论”时代的到来,当代文学理论首先要做的就是厘清“后理论”之知识图景与话语范式,并结合具体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实践经验,彻底审思与批判“元叙事”时代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困境。本文在前面已分析了“后理论”的话语内涵及以“文学性”为“阿基米德点”的本质主义诗学的理论特征。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后理论”时代,本质主义诗学陷入话语范式的“合法化”危机,具有逻辑与历史的必然。从逻辑层面而言,本质主义诗学追求普遍性与同一性的“元叙事”逻辑,力图以科学理性来构建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知识质态,其话语范式彰显出理性神话的思想谰妄与主体精神的文化迷执。从历史层面而言,本质主义诗学所秉持的现代性历史观本身就缺乏强烈的“历史性”。它对理性的遵从,对共时性研究方法的持重、对恒定本质的设定以及对文艺自律与审美主义价值的追求,营构出“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幻象。对文学“历时性”维度的现象学悬隔,使其在罹患历史健忘症的同时,也失去了理论的自反性与“历史化”动力。随着现代性的断裂、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勃兴与“后理论”时代的莅临,本质主义诗学终陷于作茧自缚的理论困境。

本质主义诗学在“后理论”时代的失范,是否意味着“文学性”话语的彻底解构?或许,作为现代文学理论创制的经典“话语陈述”——“文学性”,并不是一个绝对过时、注定要被逐出文学理

论界域的“伪命题”,像雅各布森、艾亨鲍姆、托多洛夫、韦勒克、卡勒等人对“文学性”的研究,使我们对文学的语言、程序、技法与结构等内部因素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我们理解和评价文学提供了新的参照视域。只不过在知识生产的过程当中,“文学性”话语遭遇了现代本质主义思维范式的挟持,最终走向普遍化与非历史化的本质主义牢笼。我们认为,应在批判性反思“文学性”话语的本质主义症候的基础之上,实现“文学性”话语的更新与扩容。具体而言,不应将“文学性”局限于指称文学的内部属性,而应当使其成为表征文学多元综合样态的开放性话语结构,它既可指文学的语言修辞与形式结构的独特性,也可指文学在发生、创造与接受过程中流溢出来的美学韵味。像艾柯的《开放的作品》,费什的《看到一首诗时,怎样确认它是诗》等,都将读者的审美接受视为“文学性”生成的依据。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性”并非是文学客观存在的本质属性,或是像形式主义论文认为的是文学固有的形式特征,“文学性”并不全然源自文本的语言结构,而是同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和审美趣味相关。这也就意味着,不能将“文学性”视为文学恒定的本质属性,而应以“历史化”的姿态看待“文学性”的生成。布尔迪厄将本质主义诗学的反历史化诊断为“生成的遗忘”,在他看来,“形式主义者奢望用拒绝来反对一切形式的历史化,而拒绝是建立在他对自身可能性的社会条件的无知上的”(布迪厄358)。伊格尔顿认为结构主义诗学“令人毛骨悚然地非历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106)。立足于这样的理论视域,本文认为,应从多个层面来重思“后理论”时代的“文学性”话语范式,以实现文学理论知识质态的“历史化”发展。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首先,应从反本质主义哲学中汲取能量,以破除本质主义诗学僵化的话语结构。维特根斯坦反对真理的恒定性 & 独立运演逻辑,认为语言表达的意义只有与可能运用的情势相联系才能被确认,意义的建构同具体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罗蒂所谓的“后哲学文化”就是反本质主义文化,这种文化不再相信绝对实在,而是更注重实践经验与实用价值。德里达反对恒定不变的“文学的法”,认为文学是社会文化建制的产物,“文学性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

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成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社会性法则的比较含蓄的意识”(德里达 11)。德曼认为,文学性主要表现为文学语言的隐喻、讽刺、转义等修辞功能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张力性文本结构,文学语言的含混、歧义、否定与冲突带来文学意义的延宕与不确定,文学最终变成了抵制理论、反哲学与意识形态策略的修辞性语言符码。卡勒关于文学像“杂草”的比喻以及“文学性”弥散的理论,辛普森的“文学性统治”的思想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反本质主义思维范式的影响。其次,应充分借鉴知识社会学、反思社会学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文学性”话语范式在“后理论”时代的重构。知识社会学的视角要求我们摆脱非历史、非语境化之本质主义思维范式的拘囿,强调知识生产与话语陈述的历史性、地方性、相对性与实践性。曼海姆认为,真理从来就不具有恒定的本质与普遍性逻辑,而是与社会存在与社会历史进程相关。所有人并不一定都有相同的思想,“同样的客体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会呈现不同的形式和方面”(卡尔·曼海姆 266),知识的生产与建构同特定的视角、关系、历史条件等密切相关。布迪厄的反思社会学批判了传统认识论的“非历史化”趋向与化约主义策略,强调对社会科学进行社会历史条件的反思。在他看来,实践感与文化习俗、社会结构与关系等因素决定着理论知识的建构,真理具有历史与地方的双重生成属性。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强调从社会历史的综合层面考察文学性,比如生产、传播、市场、消费与接受等。埃斯卡皮认为:“文学性最强的组合,应是那些将最高的历史真实性与最鲜明的个性、最强烈的表现性结合在一起的组合。”“从过程来看,社会性是文学性的一个方面,而从机构来看,文学性则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134)。埃斯卡皮拓展了“文学性”的内涵,为我们理解“文学性”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参照。最后,应充分借鉴跨文化、跨学科的间性思维与研究方法,在多元文化、多学科的交叉互动中建构“文学性”的话语质态。跨文化通过对不同文化语境中文学的比较,进而在差异性批评中谋求共通的“文学性”因子。跨学科要求文学研究破除学科壁垒,在学科互涉与融合中重构文学理论的多元生态格局。跨文化与跨学科方法在推动文学理论走向多元化发展的

同时,也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学性”话语范式。

立足于新的理论视域与方法论立场,本文认为,可从如下几个层面对“文学性”话语展开进一步反思。一是实践性;“文学性”并非是对文学恒定本质的抽象概括与理论说明,而是作家、读者在文学生产与接受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文学的感性体验与审美理解。实践性是“文学性”话语的思想地基与现实品格,正是活生生的文学实践,生成了文学多维复调的“文学性”,离开文学实践的土壤,“文学性”就会变成空洞的理论标签。“文学性”的实践品格,同时也决定了文学理论实践生成的唯物主义本性。二是历史性;“文学性”不是文学的先验本质,而是历史化的产物。经济生活、政治结构、意识形态、语言文化、审美精神等在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必然带来文学实践的变化与“文学性”的延异。同样的文学文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衍生不同的“文学性”。如陶渊明的诗歌,在东晋并不受重视,可到了宋代,却备受苏轼、朱熹等人的推崇,究其原因,正在于陶渊明平淡自然的诗风贴合了宋代“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的审美精神。三是文化性;本质主义诗学将“文学性”的主导因素归为审美性,将审美性理解为文学的语言形式与结构属性,把文学的认知性、伦理性、哲学性、政治性、娱乐性、实用性等同审美性剥离开来。事实上,并不存在超历史的非功利的审美性,有的只是蕴藉着文化价值与审美意义的具体可感的“文学性”。文学理论与批评应运用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理论原则,以摄取文学丰富的文化内涵。四是多元性;“文学性”不单指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审美性,而是文学多元文化属性的综合表征。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叙事性、表现性、再现性、象征性等构成了“文学性”的形式多元性。政治、历史、伦理、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素构成了“文学性”的意蕴多元性。审美性、实用性、娱乐性等构成了“文学性”的价值多元性。读者文化层理、审美趣味的差异性构成了“文学性”的接受多元性。五是相对性;“文学性”是在历史化的文学实践中生成与建构的多元综合的文化属性,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性”具有相对性。我们不要以绝对的标准代替多元的趣味,而应对“文学性”的相对性与差异性持理解之同情。赵树理文学在20世纪40年代一度被视为经典(“赵树理方向”),可自90年代以降,赵树理

文学的经典性逐步滑落,2005年北大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重要作家研究述评”中已经没有赵树理的名字。作家地位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变化,反映了“文学性”的相对性特征。六是人文性;“文学性”包孕着多元综合的文化价值属性,但根本属性还是“人文性”。所谓人文性,并非指那种抽象的、空洞的人道主义情怀,而是指文学对人的社会存在、生命意识、精神世界等方面的真实观照。文学即人学,人文性是文学基本的价值归依,是“文学性”最核心的美学精神与文化品格。这六个层面形构成“文学性”话语的家族谱系,使我们认识到,“文学性”不是文学恒定的本质,而是文学在历史化进程中生成与建构的多元复调的文化属性。作为表征文学意义的话语陈述,“文学性”不以绝对、普遍与同一性逻辑来消解其辩证综合的特质,而是始终结合文学现实,在历史化与地方化的知识生产中,努力构建相对性的文学真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性”是文学飘零于破碎时空的杳无踪迹的幽灵,是迷失于主观世界的虚妄化的意义堆垛。在“后理论”时代,“文学性”虽不再被视为审美至上的文学隐喻,但它同样不是兜售逃避与虚无的理论口实。

“文学性”话语的反思与重构,吁求着文学理论的变异与转型。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将不再局限于对文学经典的研究,而是转向具体的文学现实。文学理论的目的不是追求一劳永逸的关于文学的客观知识,不是以恒定的模子、尺度与趣味来裁判、区隔文学,而是如何用理论的知识形态去把握丰富的“文学性”。文学理论的“合法性”不是知识生产者的权力赋魅,而是源自文学活动的实践生成。文学理论的反思性、真理性必须同文学经验的实践感形成间性与融合,唯有如此,文学理论才能在历史的辩证运演过程中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从而最终实现理解文学表征、传承文学经验、介入文学实践、萃取文学价值、表达文学意义的理论目的。总之,在“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将不再固守本质、中心、同一性与普遍性等“元叙事”逻辑,不再致力于大理论、纯理论的科学性建构,不再醉心于非文学化的哲学性思辨,而是提倡回到文学文本的中心地带,在审美化的阅读中体味具体可感的“文学性”。这种话语转型必将使文学理论朝着微观化、多元化与部落化的理论路径衍进。如伊格尔顿所言:“如果所有

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局限性的、部门性的、从主体出发的、依赖个人经验的、审美化的、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和全知性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227)。总体性文学理论的断裂、“文学性”的开放性与文学理论知识范式的跨界性,形成了“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的多声部话语生态格局。文化诗学、生态诗学、新历史主义诗学、新形式主义文论、文化政治诗学、性别诗学、空间诗学……纵声喧哗、不一而足。“小写的”文学理论的不断孵化与衍生,反映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兴盛与繁荣,但我们在构建多元、民主与宽容之理论话语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理论的自反性、辩证性、历史性以及话语实践的交互性、对话性与关联性。唯有如此,才不至于陷入各自为政、自说自话的理论困境,才能真正实现文学理论在“后理论”时代的良性发展。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托尼·本尼特:《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曾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 [Bennett, Tony. *Formalism and Marxism*. Trans. Zeng Jun. et al. Zhengzhou: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 [Bourdieu, Pierre.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Liu Hui.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Press, 2001.]
- Callus, Ivan, and Stefan Herbrechter, eds. *Post theory, Culture, Criticism*. Amsterdam: Rodopi, 2004.
- 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入门》,李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 P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当今的文学理论”,《外国文学评论》4(2012): 49-62。
- [——. “Current Literature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Criticism* 4 (2012): 49-62.]
- :《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编《问题与热点》,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 [——. *Literariness*. Ed. Marc Angenot, et al. Trans. Shi Zhongyi. et al.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de Man, Paul. *The Map of Deconstruction*. Trans. Li Zixiu.

-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Derrida, Jacques. *Literature Action*. Trans. Zhao Xingguo. et al.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 [Escarpit, Robert.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Ed. Yu Pei.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 [Eagleton, Terry. *After Theory*. Trans. Shang Z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 [——.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rans. Wu Xiaom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Erich, Victor.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Doctrine*. Hague: Mouton Publishers, 1955.
- 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 [Fang, Shan et al. trans. *Literature Theory of Russia Formalism*.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 费什:《读者反映批评:理论与实践》,文楚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Fish, Stanley.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Trans. Wen Ch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8.]
- 罗伯特·休斯:《文学结构主义》,刘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
- [Hughes, Robert. *Structuralist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ture*. Trans. Liu Y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胡经之、张首映主编:《西方二十世纪文论选》(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Hu, Jingzhi and Zhang Shouying. *An Anthology of the 20th Century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Vol. 2.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 [Iser, Wolfgang. *How to Do Theory*. Trans. Zhu Gang. et al.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 詹姆斯:《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 [Jameson, Fredric. *Language of the Cage: Marxism and Form*. Trans. Qian Jiaoru and Li Zixiu. Nanchang: Baihuazhou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5.]
-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Ed. Zhang Xudong. Trans. Chen Qingqiao, et al.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 [Mannheim, Karl. *Ideology and Utopia*. Trans. Li Ming, et al.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
- [Nussbaum, Martha C. .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Luck and Ethics in Geek Tragedy and Philosophy*. Trans. Xu Xiangdong and Lu Meng. Nanjing: Yinlin Press, 2007.]
- 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 [Rorty, Richard. *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 Ed. Trans. Huang Yong. Shanghai: Shanghai Yiwu Press, 1993.]
-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 [Selden, Raman, et al. *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Trans. Liu Xiangy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托多洛夫编选:《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蔡鸿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 [Todorov. Ed. *Essays of Russia-Soviet Formalism*. Trans. Cai Hongbi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Wittgenstein, Ludwig.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Li Bulo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 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余徵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
- [Wellek, Rene. *Concepts of Criticism*. Trans. Ding Hong and Yu Zhi. Chengdu: Sichu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8.]
- 阎嘉主编:《文学理论精髓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Yan, Jia. ed. *Literary Theory: An Essential Reader*.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王嘉军)